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上海工人二次武装起义

王玉平 编写
新华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上海工人三次 武装起义

王 玉 平 编写

目 录

- 一、北伐战争促使上海形势发生变化…………… (1)
- 二、上海工人的第一次武装起义…………… (8)
- 三、上海工人的第二次武装起义…………… (15)
- 四、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 (28)
- 五、“四·一二”政变屠杀上海工人阶级…………… (37)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英勇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三次武装起义，打垮了反动军阀在上海的统治，迈出了中国工人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步。上海工人阶级的光辉业绩，在中国工人运动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永不退色的一页。

一、北伐战争促使上海形势发生变化

经过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的战斗洗礼，到1926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情况，中国的革命形势出现了新的曙光。

首先，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迅速高涨。人们看到了帝国主义外强中干的本质，“打倒列强”的口号深入人心。全国各界人民普遍支持上海人民提出的17项解决五卅惨案的条件，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收回海关主权”、“撤退驻华外国军队”。人们再也不能漠视和容忍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压迫和掠夺，普遍认为，只要万众一心，不怕牺牲，坚持斗争，就能象香港、广州的工人一样，把香港变成臭港，打得列强威风扫地。全国人民都盼望通过国共两党合作领导下的国民革命运动，把革命烈火从广州燃向北方，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取得民族独

立，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

第二，中国的封建军阀公开站在帝国主义一边，反对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在五卅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以领导阶级的面貌出现，领导全国人民向帝国主义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虽然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进行野蛮的屠杀，也没能使中国人民屈服。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迫使帝国主义者改变手法，一方面用种种诱饵吸引资产阶级脱离中国人民的反帝联合阵线；一方面指使各自豢养的军阀走狗，借口反对“赤化”，结成维护其主子在华利益的联合阵线，公然宣布“讨赤”，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大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更是甘心为虎作伥，秉承帝国主义主子的意旨，暂时放弃彼此间的争执，把枪口指向广东。他们妄想凭借帝国主义者提供的大笔贷款和大批军火，一举消灭广州国民政府，彻底镇压方兴未艾的反帝革命运动。

第三，在革命根据地广州，工人、农民、国民革命军等在省港大罢工的影响下，阶级觉悟普遍提高。他们热情支持广州国民政府，武装封锁香港，繁荣广州经济，积极参加东征和南征，使广州国民政府的处境比五卅运动之前有十分明显的好转。统一了广东地区的广州国民政府，这时不仅有信心抗御北方吴、孙、张的“联合讨赤”，而且具备了出师北伐，用革命战争打败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能力。

第四，在广州革命阵营内部，这时出现了一个以蒋介石为首领的新右派集团。这一集团以孙文主义学会为基础，利用他们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和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上炮制的

《整理党务案》，迫使中国共产党人退出了国民党中央机关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乘机攫取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革命军的最高领导权。新右派集团野心很大，他们虽身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阵营中，也主张打倒奉、直、皖等各系军阀，但他们却不愿意建立一个人民民主政权。他们希望在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过程中，借革命之机扩大自己的实力，步袁世凯的后尘，离开南方一隅，逐鹿中原，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愿望。

鉴于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在英帝国主义的撮合唆使下，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匆忙完成了彼此勾结的活动。1926年1月，直奉军阀决定讨伐南方的广州国民政府和北方冯玉祥领导下的国民军，开始了所谓的讨伐“南北二赤”的军事行动。根据“先扑灭北方之赤化，然后再扑灭广东之赤化”的部署，直奉联军于4月15日逼迫国民军退出北京，接着就在沙河、南口一带向国民军发动了总攻击。当双方在南口一带胶着的时候，吴佩孚便于5月下令部将叶开鑫进攻长沙，攻打已归附广州国民政府的湖南代理省长唐生智。张作霖与吴佩孚南北出击，摆出了要“荡平南北二赤”的架势。

军阀气势汹汹的军事行动，并不能吓倒全国的革命人民。除上海的工人运动因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联合镇压受到挫折外，全国的工农运动到处都在持续高涨着。从五卅运动到1926年5月，全国的工会组织从166个发展为699个，工会会员从45万发展到124万，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有组织的战斗

队伍。两广、两湖等地的农民运动也是风起云涌，仅广东一省便有50余万农民协会会员。这些组织起来的工农群众革命热情很高。他们认识到封建军阀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要想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就要首先打倒封建军阀。他们迫切希望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结束10余年间中国战祸连年的局面，同时也把自己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中解救出来。

1926年2月，中共中央根据直奉军阀联合，企图镇压工农革命运动的形势，在北京召开了特别会议。会议明确提出：

“本党现时最主要的职任，实在是在各方面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希望在北伐的过程中，“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范围内的胜利。”

1926年4月中下旬，吴佩孚已有向南进攻的迹象。临近5月，叶开鑫与唐生智的矛盾已发展到一触即发的程度。为了挫败吴佩孚大举进攻的部署，1926年4月2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致书广州工人，希望广州的工人阶级积极敦促广州国民政府“克日出师北伐”，以免陷于被动。5月，叶开鑫与唐生智交火，并占领了长沙。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第二次广东农民代表大会都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发动北伐战争的要求，希望国民政府“从速出师北伐”，“拯救处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宰割下之水深火热中的民众”。号召广大工农群众“在政治上要拥护广州国民政府北伐，肃清北方的反动势力”，“统一中国，建立全国的统一的国民政府”。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动员和广大工农群众的强烈要求

下，广州国民政府于5月初派共产党员叶挺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出发，援助唐生智，抗击叶开鑫，奏响了北伐战争的序曲。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颁发了北伐部队动员令。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即《北伐宣言》），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其工具军阀之暴虐。……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势力”。7月9日，国民革命军约10万人出师北伐，正式开始了北伐战争。蒋介石担任北伐军的总司令。北伐军分三路出发，西路是北伐军的主力，约8万人，沿粤汉路北进，在两湖与吴佩孚开战。中路1万余人，侧翼掩护西路并进攻孙传芳在江西的部队。东路军万余人，向敌军兵力空虚的福建、浙江进军。7月，北伐军攻占长沙、岳州（今岳阳）。8月，经过汀泗桥、贺胜桥两次战役，击溃吴佩孚主力，10月10日攻下武昌，引起全国震动。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的同时，在北方遭到直奉联军猛烈进攻的国民军依然顽强地抵抗着，拖住了吴佩孚精锐部队15万余人。尤其是冯玉祥于1926年7月加入了国民党，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公开与北伐军合作，形成了南北呼应，夹击奉直军阀的局面，使北方形势为之大变，一扫五卅以后北洋军阀施行高压政策而带来的阴沉气氛。

在革命形势逐步恢复的地区中，以上海地区革命形势的恢复最为突出。上海是五卅运动的发源地和中心地。帝国主

义和封建军阀为扑灭五卅运动，他们强行封闭上海总工会和其他革命团体，通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杀害代理委员长刘华，禁止一切革命群众运动，使上海工人运动在1925年9月进入了低潮。面对反动派的镇压与统治，上海人民积蓄力量，很快便起来进行了斗争。当五卅惨案一周年的时候，上海各界群众在中共上海区委的领导下，开展了五卅周年纪念活动。5月29日，5000余人在五卅烈士墓地举行烈士公墓奠基典礼。5月30日，上海全市罢工、罢课、罢市一天，数万人集会纪念五卅运动一周年。大会向全国人民宣告：五卅惨案尚未结束，上海人民向五卅烈士宣誓，将“继续不断地从事奋斗，以至最后的胜利，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及推翻帝国主义”。集会结束后，各界群众冲破租界当局的警戒，来到五卅惨案发生地南京路等处，示威游行。英国巡捕用木棍、水龙驱赶群众，群众以砖头石块回击。一直到晚上7点，游行示威的群众才撤出租界。乘群众运动再度高涨之势，转入地下活动的上海总工会根据当时上海物价飞涨，尤其是米价等已涨得严重影响工人生计的情况，发动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保障生活。在上海总工会的精心组织和正确指导下，工人的罢工逐渐发展成为同盟罢工，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经济罢工风潮。据《向导》杂志统计，1926年6至8月，共发生罢工112次，参加罢工工人累计达20万人次，波及厂家达300多家。斗争的内容最初是纯粹的经济斗争，以后也提出了享有参加工会的权利和反对压迫的政治要求。上海的罢工风潮使上海总工会的组织更加严密和牢固

了。工会会员从五卅运动中的20万人增至30万，许多工会还设立了工人纠察队和自卫团，用来保卫工会组织。

与上海工人运动逐渐恢复的同时，有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参加的上海市民运动，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蓬勃开展起来。由于帝国主义列强把上海视为他们掠夺中国财富的基地，因此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矛盾便比其他地区显得尖锐与激烈。五卅运动中，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曾同广大工人阶级站在一起，共同斗争。帝国主义者虽答应诸如在租界中设立华人董事等，可是一年间什么也没做，没有满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任何要求，只不过是骗人而已。1925年10月，直系军阀孙传芳在杭州就任苏、皖、闽、浙、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把上海视为禁脔之地，一方面压制上海市民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一方面排斥打击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异己势力。上海实力派人物，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因亲近皖系而被孙传芳排斥。先用鸦片商傅筱庵把他挤下会长的宝座，然后又用突然袭击的方式解除了虞洽卿的南北保卫团的武装。虞洽卿受到孙的打击，心中颇不满意，暗中拉拢各方面势力，秘密开展反孙活动。

1926年夏，北伐战争捷报频传。一直密切注视着北伐战争发展的中国共产党把上海地区政治变化与北伐战争联系在一起，从各方面开展活动，准备在上海推翻孙传芳的统治，迎接北伐军的到来。中共中央军委也同时命令中共上海区委制订新计划对付孙传芳，组织军事委员会。8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开会作出了举行反对孙传芳的决定。北伐军攻占汉

阳的消息传来，9月7日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根据这一情况，在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的会议上提出，上海地区要集中力量准备武装起义，结束6月开始的罢工浪潮。会议决定工人阶级为起义的骨干力量，要组织2000人的工人纠察队。从这次会议开始，准备武装起义成了中共上海区委的中心工作，上海总工会等团体即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一工作中来。

二、上海工人的第一次武装起义

1926年秋，北伐军攻入江西和福建。孙传芳把大批主力调往前线抵抗，江浙地区兵力空虚，上海地区也只有3000余名军警。中共中央认为上海已开始出现武装起义的好条件，指示中共上海区委密切注意形势，准备用武装起义创造一个“革命的上海”。就在中国共产党准备在上海搞武装起义的同时，上海的头面人物虞洽卿加紧了反孙传芳的活动，广州国民政府派出的军事特派员钮永建也到达上海。虞钮二人不仅密切注视着形势变化，而且派人与上海总工会联系，准备联合打垮孙传芳。

在上海，中国共产党长期开展工人运动，群众基础深厚。上海总工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6～9月的罢工风潮，巩固了各级工会组织，并且建立起有2000人的纠察队，是上海所有反孙传芳力量中最强大的一支力量。广州国民政府派到上海的特派员钮永建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时曾任上海地区的松江军政府都督，与上海各界上层人士有着广泛

的联系。他携款10万元到达上海后，通过黄金荣、杜月笙等青帮流氓拉起一支由帮派分子和落伍军人组成的队伍，准备用招降纳叛和少数人军事冒险的形式夺取上海。虞洽卿是上海的头面人物。他多年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在交易所活动中与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有过旧交。五卅运动中曾与上海总工会等革命组织有过接触。他所控制的保卫团虽然被孙传芳缴过械，但经过向孙疏通后，仍然还有一定的活动力量。

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和对三种反孙力量的分析，中共中央认为虞钮二人只是一时的左倾，他们反孙带有投机性质，目的是要借助工人的力量，取得他们自己的“政治地位”。但是，工人阶级没必要拒绝与他们的联合，而且还可以利用与他们的联合，壮大自己的力量。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制订了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的策略：工人阶级虽是这次起义的先锋，但组织与战斗力都不很强，全国的政治环境也不适合工人阶级单独行动。因此，这次起义应该搞联合武装起义，并在起义时把虞洽卿推到领导地位，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式的上海自治政府。要尽力在上海减少军阀的势力，使工会组织能够公开合法地活动，使革命群众获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并把上海变成反抗租界帝国主义势力的根据地。

确定了起义的总策略以后，中共上海区委即开始进行具体的准备工作。在宣传动员方面，中共上海区委在9月6日发布《告上海市民书》，揭露军阀统治下的上海，是“最少数的外国人和最少数的中国大买办大官僚的上海，是亡国的

上海”。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和大买办阶级残酷剥削压榨上海人民，象豺狼一样吮吸上海人民的血汗。一切苛捐杂税就象一道道催命符，要逼死“我们的老和小，送我们的命”。上海人民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起来反抗，和全国人民一起走中国民族独立和自由解放之路。罗亦农还和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赵世炎、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人深入到基层，给工人讲解局势和北伐战争的意义，动员工人群众坚定革命信念，起来反抗孙传芳的军阀统治。在组织方面，对党与工会的组织进行必要的调整，以适应武装起义的需要。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反复强调，各方面工作要抓紧，他要求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成为领导起义的军事委员会，要求上海总工会把2000名纠察队员按浦东、南市等区编队，每300~400人编为一大队，下编中队、分队。中共上海区委还组织军事训练班，由中央军事委员和技术书记奚佐尧分批训练纠察队的队长。训练班结束后，这些人再回去训练其他队员。汪寿华还利用与青帮的联系，收买警察厅和租界的侦探，从他们手中搜集各种各样的情报。在争取同盟伙伴方面。加紧了与虞洽卿、钮永建的联系。9月初，中共中央决定起义后，汪寿华即奉命找虞洽卿谈此事。虞洽卿见工人方面愿意与他合作，并要让他出来，成立上海市民自治形式的政权很感兴趣。他还表示可以联系租界上的英国当局，不让他们干涉此事。对于虞洽卿，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认为他是上海的头面人物，应该让他出来当起义后地方政权的领袖。经过几次商谈后，汪寿华对虞的工作做得很顺利，已经

和他具体商谈了上海地方政府的组织问题。但是，资产阶级不可能有坚定的革命性，尤其是像虞洽卿这样多年活跃于政坛的老手，当政治暴风雨来临时，更会是如此。正当汪寿华与虞洽卿联系时，上海的《商报》于10月12日透露出上海将有“暴动”的消息，警察厅长严春阳通知虞洽卿离开上海。虞洽卿看到风声吃紧，吓得马上躲了起来，再也不与汪寿华联系了，不肯出面组织事先谈妥的保安委员会，也不肯出面组织各帮各业资本家支持和参与起义的会议，甚至登报“在商言商”，表示自己与起义完全没有关系。虞洽卿的这种转变，使中共上海区委无可奈何，只得要求他行动上中立，态度上反孙即可，把工作重心转向了钮永建。钮永建是1926年9月中旬到上海的。到上海之前，他曾与孙传芳手下的浙江省长夏超有过联系。双方约定夏超在杭州宣布独立，并率部下3000警察进军上海，钮则乘机在上海暴动，夺取上海。10月11日，钮的代表与汪寿华等人会谈，彼此询问了对方的实力与设想。双方各自分头汇报后，钮感到自己在上海的力量不足，想把工人的起义纳入他夺取上海计划之中。中共中央则认为钮有一些力量，尤其是当夏超脱离孙传芳后，与钮联合，可以达到推翻孙传芳统治的目的。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上海的联合暴动，夺取上海。经过几次商谈，钮永建和中共上海区委达成了口头协会。钮永建同意与工人一起起义，但要求工人与学生要接受国民党党部的指挥，钮要掌握“总政权”。对于钮的要求，汪寿华当场同意，同时向钮的代表提出工人的武装与经费问题。因钮把目光集

中在夏超身上，也不愿工人的力量强大起来，自然舍不得用钱武装工人。几经讨价还价，他才慢吞吞地从广州国民政府给的10万元中，拨出1万元给上海的工人纠察队买武器。在军事准备方面，利用各种方法筹集武器弹药武装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虽有2000人，但武器极少，只有数十支手枪。靠这点武器，显然不足以应付起义的需要。为武装工人，中共上海区委多方想办法，没有钱买，就组织共青团员李强等青年知识分子自己动手研制。李强等买来英文版军火书籍，根据书中介绍的方法与配方，秘密进行了实验。经过多次试验，终于研制出炸药和雷管，然后用罐头盒做外壳，日夜赶制土炸弹。从钮永建处得到1万元以后；马上从外国海员、黑社会组织和军阀部队官兵的手中购买枪支和手榴弹。到起义前夕，工人纠察队已有130支枪，一批手榴弹和土炸弹了。没有武器的纠察队员们便每人拿一把榔头或斧头等工具。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工人纠察队的战斗力增强了许多。

1926年10月26日，夏超看到北伐军攻下武昌，孙传芳在江西吃紧无力顾及江浙地区，就在杭州宣布脱离孙传芳，按照与钮永建的约定派警备队向上海进军。消息传到上海，上海的军阀势力陷于混乱与惊慌之中。中共上海区委认为这是个时机，马上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准备立即武装起义。在这次会议上，由罗亦农、李震瀛、奚佐尧、钟尔梅等组成武装起义总指挥部。罗亦农、汪寿华、李震瀛、奚佐尧并组成了工人纠察队指挥处，具体抓工人纠察队的起义行动。从17日到19日，中共上海的各级组织连续开会部署武装起义的各项具

体活动,要求各方面的负责同志动员全体力量参加起义。2000余工人纠察队员按照大、中、分队的编制,准备好枪支、手榴弹、土炸弹、榔头、斧头和铁尺等,斗志昂扬地进入了临战状态。19日,中共上海区委进一步决定,武装起义发动后,工人纠察队首先进攻力量相对薄弱的警察署,夺取警察手中的武器武装自己,然后南市区、法租界的工人纠察队与钮永建的武装一起攻打高昌庙的兵工厂(制造局)、孙传芳的龙华司令部、淞沪督办公署和淞沪警察厅。闸北区和浦东区的工人纠察队集中力量攻打火车站和沿江码头,接应黄浦江中的起义海军。起义的各路人马在预定的地点,以黄浦江中军舰的炮声为信号,一齐行动。

在夏超挥师进逼上海,工人纠察队枕戈待旦,武装起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身为起义总指挥的钮永建却观望来观望去,迟迟不下令起义。起义时间一拖再拖,使夏超处于孤掌难鸣境地,孙传芳得以调动军队回身向夏超反扑。23日,孙传芳的部队即攻占杭州,夏超本人逃亡。钮永建炮制的起义计划,实际上已经破产。在这种情况下,起义领导机关应该当机立断停止发动起义,以避免不应有的损失。不料中共上海区委却误认为北伐军在江西大胜孙传芳,攻占九江的消息是确实的,冒然决定24日拂晓举行起义,执行与钮永建建议定的起义计划。

因为钮永建的队伍成份复杂,起义前夕发生了严重的泄密问题,使淞沪警察厅长严春阳得到了有关起义的计划。他亲自披挂上阵,部署兵力,准备镇压武装起义。23日夜晚,

上海的马路上到处都有巡逻队持枪巡逻。高昌庙兵工厂、火车站、码头等起义攻打的目标都派有重兵把守，连租界的巡捕也全副武装在租界的各个路口进行戒备。这时，中共上海区委和上海总工会也接到了情报，感到情况严重，敌人已经做好准备，起义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于是马上决定停止行动，并立即派人分头通知各区的工人纠察队。大多数工人纠察队员接到了停止行动的命令，有组织地退却了。也有一些人没接到命令，在指定地点等候军舰的炮声，直到清晨也未听到炮声，只好分散退去了。只有南市区的工人纠察队未接到停止武装起义的命令，也没听到炮声，就按时向斜桥、大木桥、日晖港的警察署发动了攻击。除在日晖港缴获4支步枪，俘虏7名巡防队员外，其他都因反动军警火力太强，寡不敌众，不得不撤出了战斗。

在起义过程中，共产党员、上海工人起义指挥部技术总指挥、南市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奚佐尧被巡防队逮捕。浦东区工人纠察队指挥部被警探发现，浦东工人纠察队总指挥、上海码头工会委员长陶静轩等6人被抓走。24日当天，孙传芳的心腹李宝章率部队进驻上海，残酷镇压起义工人。百余名工人纠察队员被逮捕，大批工人被资本家开除出厂。奚佐尧被捕时，勇敢地承认自己是工人起义人员，为避免家属与同志受牵连，他化名为李佐人，拒绝“招认”起义的领导机关和“同党”。虽然受到残酷的拷打，他仍大声揭露军阀的罪恶，表示反对军阀的坚强意志。10月26日，英勇就义。工人领袖陶静轩被捕后与奚佐尧一样，备受刑讯，坚贞不屈，不

停地对士兵进行宣传，劝告他们不要做军阀的走狗。11月17日，他也惨遭杀害。就义前，他要求面向工人集中的沪西，表示他至死不能忘记沪西的工人弟兄。

上海工人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就这样失败了。从10月24日起义失败的当天下午到26日上午，中共上海区委和上海总工会连续召开会议，各路人马的负责人汇报起义的情况。会上分析了失败的原因后，决定继续准备武装起义。经过多方面的讨论，会议认为从政治罢工发展到武装起义，在历史上具有很大的意义。虽然只是“小小的尝试了一次”，但毕竟迈出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步，并且取得了许多经验。起义不仅动摇了敌人的军心，而且给被压迫的工人群众极大的信心。会议还认为武装起义必须选择最有利的时机。具体到上海而言，应该选择在北伐军“兵临城下”最为适宜。会议认识到城市武装起义必须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不能本末倒置，把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者的武装当作主力。在总结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中共上海区委决定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增强领导武装起义的信心，加强工人纠察队的力量，动员广大工人群众参加准备得更充分更有计划的第二次武装起义。

三、上海工人的第二次武装起义

虽然上海工人的第一次武装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但这只能延缓孙传芳在上海的军阀统治，丝毫不能从根本上挽回他的败局。11月初，北伐军的进攻重心从西路转至中路。5日